

# 香港日治時期日本佛教徒與基督徒 領袖的「和平觀念」比較<sup>1</sup>

陳智衡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 一 引言

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日本軍隊佔領亞洲多個城市。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軍事侵略香港，港英政府最終於12月25日投降。不久，「香港占領地總督部」成立，香港由英國統治的國際城市，迅間變成日本專制政權統治的城市。在日本的統治下，香港社會、文化和經濟等都被嚴重衝擊，宗教亦不能倖免。本文主要討論香港日治時期佛教和基督教在推動和平觀念上的異同之處，從而帶出這兩個宗教與日本政權的政教關係。

<sup>1</sup> 本文原定在日本福岡的「宗教視閩下的亞洲共同體之和平研討會」（2020年2月13-14日）發表，可是因全球疫情爆發而被迫擱置。

## 二 日政府對香港宗教態度

當日本統治香港後，就開始思考如何管治英國殖民地香港的問題。當時軍政廳總務部長日軍少將矢崎勘十（Yazaki Kanju）在所發表的〈香港統治策略之我見〉（1942）中指出：

余以為，此次大東亞戰爭將解放受英、美民族壓迫之東亞民族，在帝國之領導下謀求安宅和發長。因此，在我日本國根據此次戰爭將佔領地區施政之根本方針，要拋棄異民族管活或所謂帝國主義統治者之觀念，必須基於東亞諸民族協同團結下之共存共榮、民族協和之理念。不然，余以為東亞諸民族協同僅僅由日本之統治代替以往歐美勢力之統治而已。……

吾以為蓋強力之政治並非倚彈壓之勢，亦非以阿諛之政治施與現在民也。香港之統治須以現住民欣然協力之施政方可為之也。<sup>2</sup>

矢崎的看法與石原莞爾（Kanji Ishiwara）的「東亞聯盟論」相當接近，認為日本政府對香港的統治，不需要把住在香港的人變成日本人，而是改為華人必須要與日本人合作就可以了。石原莞爾認為的「世界最終戰爭」，就是將來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和以美國為中心的美洲進行最終戰爭。若要最後贏得這場戰爭，那中日和平就不可以或缺。所以提出「以華制華」的統治方針，當時這理論影響很多日本軍人。<sup>3</sup>

對於「香港占領地總督部」而言，他們對香港宗教團體的管理，也離不開這些觀念影響。他們認為佛教寺廟數目少，所以指導監督上沒有特別障礙。可是基督教卻相對複雜，分支多，信徒涉及不同國籍的人。此外，他們認為香港宗教大部分比例都屬於基督教，故此對基督教政策

---

<sup>2</sup> 小林英夫、柴田善雄著，田泉、李璽、魏育芳譯：《日本軍政下的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頁31～32。

<sup>3</sup> 小林英夫、柴田善雄：《日本軍政下的香港》，頁32～33。

需要特別的審慎態度。<sup>4</sup> 日本是以武力來奪取香港政權的，他們為了統治順利，宗教自然是安定民心的重要部分。當時香港占領總督部參謀長菅波一郎(Suganami Ichiro)少將，是當時總督磯谷廉介總督(Rensuke Isogai)之下的第二號人物。菅波少將曾長年駐留海外擔任武官，精通英語，思想深湛。香港基督教總會最高顧問鮫島盛隆牧師(Rev. Moritaka Samejima)曾形容菅波一郎少將是位雄辯家，是一位見聞遍及世界的儒將。<sup>5</sup> 菅波一郎指出：

此地的軍政，最重要首推宗教工作。為安定民心，賦予信仰上的安心，當比什麼都重要。就是使他們能夠安然定心，拜其所信上帝。拜神的自由若被剝奪，不啻失卻一切。自中日戰爭爆發迄今，日本贏了戰爭，卻失了民心。肇因於對宗教無正確認識。<sup>6</sup>

菅波一郎認為普遍日軍並不認識宗教的本質與作用，這缺欠使日本雖得天下，卻失去民心。故此，當日本佔領香港後，他就嘗試加強各宗教界及政府的溝通。當時總督部邀請日本基督徒平岡貞(Tadasu Hiraoka)和日本佛教徒宇津木二秀(Utsuki Nishu)於1943年2月25日舉辦宗教懇談會，並邀請各宗教團體派代表參與。當時參加團體有基督教、天主教、回教、印度教、佛教等中日代表數十人。是次懇談會還有文教課長尾課長(Mr. Nagao)、江原辰二(Ehara Tatsuji, 佛教)、岡田五作(Rev. Gosaku Okada, 基督教)、藤田一郎(Fujita Ichiro, 基督教)等出席。<sup>7</sup> 在此次懇談會中，先由平岡貞和宇津木二秀致詞，

---

<sup>4</sup> 趙雨樂、鍾寶賢、李澤恩編注，王琪、張利軍譯：《軍政下的香港：新生的大東亞核心》（香港：三聯書店，2019），頁168。

<sup>5</sup> 鮫島盛隆著，龔書森譯：《香港回想記：日軍佔領下的香港教會》（香港：文藝，1971），頁88。

<sup>6</sup> 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頁87～88。

<sup>7</sup> 〈大東亞戰爭遂行中・各宗教應團結一致・昨午宗教代表懇談會經過〉《香島日報》（1943年2月26日）。

後由文教課長尾課長訓詞，最後各宗教代表就互相討論與交流。<sup>8</sup> 然而，長尾課長在訓詞時道出日政府對各宗教的期待和要求：

……以日本言之，凡各宗教均為本國努力進行各種事業者，本人對此，實深感欣快。希望今後凡亞洲民族中間其宗教都能本此精神造去，努力於各愛其國，共愛東亞之實踐。諒今日與會之各宗教長者，亦必有自覺之預備，以求相互之提携合作，從而努力貢獻於社會及國家，向着建設東亞之大道。<sup>9</sup>

日本政府基於政治的考慮，對各宗教擺出友善姿態。官員訓詞中表示「努力於各愛其國，共愛東亞之實踐」；「相互之提携合作，從而努力貢獻於社會及國家，向着建設東亞之大道」。一直以來，各宗教領袖彼此從不往來，各自以其宗教信徒來發展宗教徒。但這次政府安排他們共聚，他們自然不能拒絕，只得順服跟隨。對於統治者而言，宗教功能不止是個人信仰，而是需要參與日本帝國的大東亞共榮圈計劃。對於是次懇談會，當時香港浸信教會的劉粵聲牧師曾回應說：

1943.2.25 午二時，在松原酒店九樓，由日本基督徒平岡貞及日本佛教徒宇津木二秀二人發起，邀請各宗教教徒開懇談會，到耶教 19 人，佛教 19 人，天主教 5 人，道教 1 人，印度教 3 人，回教 2 人，金光教 1 人（Konkokyo），共 50 人聚集一室，由文教課長長尾致詞云：願各宗教在精神上聯絡，在新政治下團結云云，旋由各宗教發言，彼此聯絡。余乃第一次參加宗教之聯合敘會，是余之破天荒，亦即香港破天荒之舉也，故特為之記焉。<sup>10</sup>

日本統治者舉辦這次懇談會，除了讓官方可以一次過向各宗教代表領導表達想法外，亦希望透過這次活動讓各領袖彼此認識。同時，

<sup>8</sup> 〈大東亞戰爭遂行中・各宗教應團結一致・昨午宗教代表懇談會經過〉，《香島日報》，1943 年 2 月 26 日。

<sup>9</sup> 〈宗教代表——懇談會經過〉，《華僑日報》，1943 年 2 月 26 日。

<sup>10</sup> 劉粵聲著，李金強整理：〈兩廣名牧劉粵聲及其日記——粵聲事記 1918-1955——的刊印〉，《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 29 期（2022 年 10 月 15 日），頁 8。

他們亦會分析各宗教的不同體制，謀求改造各宗教組織，以配合政府的政策方向。他們以管理宗教的角度來分析三個香港主流宗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他們認為天主教有着完善的架構制度，如樞機主教、主教、神父等的組織架構鮮明，與軍隊官階制度相似，神職人員之間亦有從屬性，故此對政府來說容易掌控。相對來說，基督教宗派和堂會林立，並沒有如天主教統一和從屬性的教制體系，而唯一聯繫各宗派堂會的就只有「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The Hong Kong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es Union），而這聯會只是聯盟性的關係，並非隸屬關係。只要教會合乎資格都可以申請加入，會員亦可以隨時退出。故此，政府若要控制基督教團體，唯一的方法就是把這組織改造為從屬組織架構，以方便管理。至於佛教的組織則被政府評為最惡劣，他們認為佛教既沒有如天主教般的從屬組織架構，就連像基督教的聯盟組織也沒有。各佛教寺院獨立運作，在政府眼中就如一盤散沙。因此，若要有系統地管理佛教的寺院僧侶，就須先為他們建立全新的佛教聯合會，以把全港所有寺院歸入此組織之下。<sup>11</sup>

### 三 日本佛教領袖與香港佛教羣體

佛教是東南亞地區的重要宗教之一，其信眾遍布多個國家。當日本佔領香港後，多個日本佛教團體來港設教，例如藤波大圓（Fujinami Daien）負責的「真宗大谷派本願寺」、倉野小太郎（Kurano Kotaro）負責的「宗教結社日蓮法華宗香港佈教所」，後來藤井日達（Fujii Nichidatsu）等人在香港島禮頓山設立「日蓮法華宗香港日本山妙法寺」，還有佐藤惠俊（Sato Eshun）負責的「日蓮宗身延山香港別院」和山口彰禪（Yamaguchi Akiyochi）的「曹洞佈教所」。<sup>12</sup> 日本佛教雖然在港設教，但當時的影響力甚微。而總督部關注的，是如何管理多個香港佛教團體。

<sup>11</sup> 胡恩德：《我們的教會》（香港：喜樂福音堂，2002），頁137。

<sup>12</sup> 鄧家宙：《香港佛教史》（香港：中華書局，2015），頁84。

日本人認為佛教寺廟齋堂極少，故此在指導監督上沒有特別的障礙，可「採取盡可能扶植其發展的政策」。<sup>13</sup> 1942年4月，廣州的「國際佛教協會華南支部部長」鐵禪和尚丁香港進行「和平運動」，目的是向香港佛教人士傳達「以佛教精神建設大東亞之意義」。<sup>14</sup> 總督部為方便管理，故此邀請日本佛教法師到香港成立「香港佛教聯合會」，並且把香港大小佛教寺院和團體組織起來。1942年7月31日，一眾籌委在東蓮覺苑舉行第一次「香港佛教聯合會」籌備會議，代表日本佛教出現會議的有日本龍谷佛教大學教授宇津木博士及西本願寺主任本山義城法師（Motoyama Gijo），<sup>15</sup> 而代表華人的則有荃灣鹿野苑的若舜、沙田普靈洞的觀本、荃灣東普陀寺的茂峰、青海雲蘭若寺的靄亭、大嶼山寶蓮禪寺的筏可、芙蓉山竹林禪院的茂芬、粉嶺靜廬寺的化超，以及馬鞍山、大埔和元朗等地禪林男女主寺。<sup>16</sup> 文教課長在典禮致詞時更進一步向各佛教團體僧尼有所暗示：

……目前到場四百多人。大家是否合作。應該心想一下。如果能夠合作。固然很好否則也可領教先覺者。達此目的。末了。希望各位本着佛教的思想和精神。做團結的工作。<sup>17</sup>

這「香港佛教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在眾多佛教領袖的參與下（縱使他們可能不大願意），定出8月24日為該會的成立日子，整個籌備時間不足一個月。香港佛教聯合會的暫定會則內容：

本會根據佛教精神在東亞共榮圈之內聯合香港佛教徒致力於宗教文化事業。

<sup>13</sup> 趙雨樂、鍾寶賢、李澤恩編注：《軍政下的香港》，頁168。

<sup>14</sup> 鄧家宙：《香港佛教史》，頁83。

<sup>15</sup> 〈中日佛教聯合會成立〉，《華僑日報》，1942年8月2日。

<sup>16</sup> 〈日華同志大聯合——佛教聯合會明日成立〉，《華僑日報》，1942年8月23日。

<sup>17</sup> 〈佛教聯合會成立〉，《華僑日報》，1942年8月25日。

本會由香港日華各佛教團體及正信佛教徒組織之。<sup>18</sup>

這聯會的成立過程及其宗旨目的，皆充滿政治性，配合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國策，宇津木法師就曾道出這佛教聯合會的成立目的。

今日在香港占領地區召集佛教聯合會成立大會。謹將我佛教徒眾團結之旨趣為諸君告。方今世界之動態，實為有歷史以來所無之新轉變。在過去百多年來，專橫於東亞各地之歐美民族，握其支配權，我們欲復興東亞各國之固有狀態，必須致力於東亞共榮圈確立之偉業。我們佛教信眾，一秉佛陀這教之精神，領導民眾，精誠努力翼助之，以期大業完成，此則本會之旨趣也。<sup>19</sup>

佛教聯合會角色相當明確，就是「佛教徒眾團結」，「致力於東亞共榮圈確立之偉業」，使香港佛教徒跟隨日本政府的方向。然後，對於當時在港的華人，對這要求相當消極。因宇津木法師空降的日本佛教領袖，加上寺廟一直以來都獨立運作，無兵司令宇津木法師必然是舉步維艱。所以他務必要有屬於自己的寺廟，方可推動政策。宇津木二秀於是駐荃灣東普陀寺，取代原屬茂峰法師的方丈住持之位。從宇津木二秀發表的進院宣言，我們可以窺見此事件的點滴來由。宇津木二秀的進院宣言如下：

本人應香港占領地區中國佛教徒之推選，所以勉就東普陀寺住持的任務，本人趁今日進院伊始，得向中國佛教徒貢獻一點意思。釋迦牟尼佛昭示我們，常說世界是苦海，但他不說人們為苦難所征服，並且強調說人類必須征服苦境，即是離苦得樂。現下大東亞戰爭當，全人類沉淪於苦境，但全部人類幾時纔可以解除這種痛苦呢？這要期待大東亞把英美惡勢力消滅之時。以何方法解除痛苦呢？就是需要我大東亞各民族同心同德，協同一致，向同一目標邁進。這樣，決定能達到目的的。現下香港地區全體佛教徒

<sup>18</sup>〈佛教聯合會今日成立〉，《華僑日報》，1942年8月24日。

<sup>19</sup>〈佛教聯合會成立〉，《華僑日報》，1942年8月25日。



亦應互相協力，將從無組織無團結的渙散現象，認真檢討，並且努力去改進為有組織，並且團結起來，以征服現在的苦境。如何你們寺院，你們的家庭，你們的個人，有怎樣困苦，需要本人，尚有許多事情需要本人協助，本人決定盡我責任，盡量協助你們。將來本人尚有許多事情，需要你們協助，但總是為各位的福利，所以要請求各位奮起勇猛精進的精神，自利利他的情緒，和本人充分合作，互相協助來弘揚佛法，利益眾生，這是本人今日所貢獻一點意思。<sup>20</sup>

從宇津木二秀的宣言中，看出他把佛教脫離苦海的觀念套在大東亞共榮的觀念上，認為日本消滅英美勢力的時候，就是「征服苦境」、「離苦得樂」。而現在的苦境，需要彼此團結，昔日「渙散現象」，今日必須「認真檢討」。而在這前題之下，若大家有事求助於他，他定必幫助。同樣，他亦有很多事情需要眾人協助他，互相幫助，有來有往。簡而言之就是等價交換，若想得到宇津木二秀協助，請華人佛教領袖信徒也都協助他，他定必回報。

因着宇津木二秀是日本派往香港佛教團體的官方代表，所以他自然有保護和協助香港佛教的能力。例如因他居住在東蓮覺苑，該處瓦片自然不會被破壞。<sup>21</sup> 宇津木二秀主要推行四個計劃：（1）提供貧民免費醫療；（2）推動佛徒教育，增進其知識及推行日語之普通化；（3）把東普陀寺的原有地產轉為農場園林；（4）改善僧尼生活，增加生產。<sup>22</sup> 然而，寺院自耕農作物的方法，實在是杯水車薪，連自給自足都成問題。<sup>23</sup> 無論如何，宇津木二秀的日本人身分雖然可以帶給佛教團體的幫助，結果卻沒有實質作用。反之，宇津木二秀的政治味

<sup>20</sup> 〈荃灣東普陀一新方丈宣言〉，《華僑日報》，1944年2月1日。

<sup>21</sup> 潘麗瓊：《東蓮覺苑：香港佛教傳奇》（香港：快樂書房，2019），頁35。

<sup>22</sup> 〈佛教聯會設立慈善診療所〉，《香島日報》，1944年1月12日。

<sup>23</sup> 陳智衡：《太陽旗下的十架：香港日治時期基督教會史（1941—1945）》（香港：建道神學院，2009），頁128；鄭宏泰、黃紹倫：《山光道上的足跡：東蓮覺苑八十年》（香港：三聯，2016），頁145。



道太濃烈，常為政權背書，加上民族主義情緒所影響，華人佛教領袖自然只會敷衍應付，並沒有與他合作推動香港佛教在日治時期的發展，也甚少合作應對不同的問題。

## 四 日本基督教領袖與香港基督教羣體

### （一）總督部參謀長對基督教的態度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與英美變成敵對國，基督教與西方國家有深厚關係，日本政府對基督教相對更謹慎。日本人認為香港的「基督教內容複雜、分支較多，信徒包含各國人羣，且佔據了香港當地宗教的大部分比例，因而在基督教政策上需要特別審慎的態度」。<sup>24</sup> 雖然如此，作為參謀長的菅波一郎，卻對基督教相當友善和重視。他對香港基督教的宗教工作有以下的看法：

基督教是香港民眾人的主要宗教，為安定民心，必指導並協助基督教繼續其健全活動，駐港日本人牧師要以之為前提，深入信徒羣中，為之排解困難事件，要做符合牧師天職的體貼諒解的援助。當然，在軍隊佔領的統治下，安定民心，保障生活實為首要政策，然而其中尤要者當屬保證各人信仰自由，尊重並保障各人所崇信的宗教與教會。但在戰爭的非常時期，所謂體貼他人，疼愛他國民眾這事，乃是最易忽略的，何況常因征服者，勝利者的優越感，以及對宗教的不理解或輕蔑等，反易釀成橫加壓迫的後果。我的主要任務就是謀取官民的溝通融和，以防止這種事態的發生。日本的軍人，官僚，政客，教育家，警察人員等這些所謂統治階層的大員，一向目基督教為邪教，或竟視為危險的革命思想，所以有人加以輕蔑，有人仇視，有不少人甚至企圖力加撲滅。戰爭時，連在日本國內也已有多名牧師或信徒，毫無理由地被警

<sup>24</sup> 趙雨樂、鍾寶賢、李澤恩編注：《軍政下的香港》，頁 168。

察或憲兵所逮捕，拘禁，甚至繫身獄中，這些已非風聞，而是被證實了的事實。在國內如此，何況在外地戰場或佔領地區，傲慢無知的戰勝者們驕狂成性，其壓制迫害更是頻仍無已。而香港常發生這事，更是不待贅言。如今，賦予我的使命便是要戢止這類情事，使之不再發生。我就是為此而設的「最高顧問」。<sup>25</sup>

從菅波一郎的說話中，可見他重視香港人有信仰自由的權利。他對日本各界仇視基督教的行動甚為不滿，故此對基督教甚為同情和好感，並且誓言不讓他的管轄地出現狙擊基督教的情況出現。菅波一郎更對後來協助香港教會的最高顧問鮫島盛隆牧師說：

如果教會有甚麼請求，都可以找他，無事不可解決，甚至如何憲兵部對教會無禮，也可告訴他。<sup>26</sup> 你們在工作上，萬一與軍人、官吏，尤其是憲兵等有何糾纏問題，儘管提出我的名字。或是通知我出面，我當盡力相助……<sup>27</sup>

菅波一郎這樣的表態，那等於給於鮫島盛隆牧師一份祕密武器，希望鮫島牧師可以盡力協助香港教會。這可見日本政府高層中，亦官員對香港基督教是相當支持，相信這也體現在鮫島牧師來香港之前的教會情況。

## （二）日本基督教領袖與香港教會

在香港日治時期，對香港教會有重要影響和幫助的日本基督徒分別是平岡貞和鮫島盛隆牧師二人。首先，平岡貞早於 1907 年已經到香港經商，並參與華人的公理會堂（China Congregational Church）聚會，並視堂會主任翁廷生牧師為屬靈父親。後來他雖然帶領日本人的基督教會，

<sup>25</sup> 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頁84~85。

<sup>26</sup> 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頁49。

<sup>27</sup> 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頁88。

可是他與公理會堂仍保持良好關係。在太平洋戰爭前夕，日本人教會於1941年9月關閉，而平岡貞等人準備離港。<sup>28</sup> 在平岡貞離開之前，他把日本基督教會的物品托給公理堂暫時保存，其中更附上一份用日文寫的信件說「把聖器交於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的翁牧師保管，翁牧師對日本人以及日本人教會的歷史最為理解，也曾給予支援」。<sup>29</sup> 後來的香港基督教總會顧問鮫島盛隆牧師指出：

當關閉日本人教會時，平岡先生將教會所屬的聖餐或洗禮所用銀質禮器，交請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翁挺生牧師保管，誰也料不到翁牧師的公理教會，因保管聖禮祭器，而於日軍佔領香港時，記得免禁止崇拜的處分。詳細情形是這樣的；當日軍命令所有新教會（即中國人教會，因為英人教會已悉數撤退）不可再集會，傳道，某日，日軍將官偕同翻譯，前來教會視察，翁牧師出示平岡先生交托保管的祭禮用器及請托書信，該將官閱信畢，突舉手行禮，就貴教會可以集會。於是在全港教會被禁止禮拜或傳道集會時，公理堂卻成唯一例外，允許教會活動。平岡先生於一九四二年由日回港，才知悉這事，對神的奇妙運用，讚美聖名，久久不已。<sup>30</sup>

因着平岡貞刻意把聖禮器皿給翁牧師，並且留下日文信件，明顯是借此保護教會，後來事實證明確實如此。當日軍佔領香港後，有日本軍官抵達公理會堂後，在不需翻譯的情況下直接閱畢信件，隨即向聖禮器皿敬禮，並且說「你們的教會可以進行禮拜與集會」，然後離開了。<sup>31</sup> 後來當平岡貞於1942年2月回到公理會堂參加主日崇拜的時候，他雖然遲到，但崇拜卻因他遲到而暫停。平岡貞回憶當天的情境說：「年輕的副牧師在講道，看到我進來後終止了講道，向大家

<sup>28</sup> 陳智衡：《太陽旗下的十架》，頁172。

<sup>29</sup> 平岡貞，平岡菊子編：《平岡貞自伝》（東京：出版社不明，1975），頁104。

<sup>30</sup> 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頁15。

<sup>31</sup> 陳智衡：〈香港日治時期中日教會領袖的接觸與互動〉，王成勉主編：《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台北：中央大學，2019），頁115。

說到『現在我們教會的大恩人平岡貞先生來參加禮拜。請大家起立歡迎』。<sup>32</sup> 這可想而知，公理會堂眾人都知道他們沒有被日軍騷擾，並且順利繼續有崇拜聚會，是全賴平岡貞的保護。翁廷生牧師曾衷心感激平岡貞的幫助說：

得知您即將回國，感到十分的可惜與不捨。感謝您對於教會與教友，特別是對於我以及我的家人長久的關愛。您在信中寫到我們在這片土地上不能再相見，但是期待着在天國與您相見。雖然我們在天國可以再會，但是我期待着自己在回天家之前再次相見……。<sup>33</sup>

除了平岡貞外，另一位對香港教會有影響的是鯨島盛隆牧師。香港自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多國不同的基督教宗派差會派遣傳教士到香港建立教會，故此香港基督教宗派林立。在總督部的促使下，香港基督教總會於1943年2月17日成立，只有加入該會的才是合法的教會團體，從此基督宗派在香港有短暫的消失。<sup>34</sup> 香港基督教總會首屆會長由德國背景的禮賢會香港堂的王愛棠牧師擔任，而副會長則是香港浸信教會的劉粵聲牧師，而日本信徒平岡貞及藤田一郎則成為參與一職。<sup>35</sup> 香港基督教總會成立後的急需工作之一，就是透過總督部請求日本基督教團差派日本牧師協助。當然這要求或多或少有總督部的心意在其中，為的讓日本牧師成為該會的負責人，以管理基督宗教團體。有關當局經過一輪程序後，最後關西學院宗教部主任鯨島盛隆牧師被選上，並於1943年9月19日由日本福岡乘軍用飛機經上海到達廣州，再坐火車到香港九龍就任。<sup>36</sup>

<sup>32</sup> 平岡貞，平岡菊子編：《平岡貞自伝》，頁104~105。

<sup>33</sup> 平岡貞，平岡菊子編：《平岡貞自伝》，頁105~106。

<sup>34</sup> 陳智衡：《太陽旗下的十架》，頁236。

<sup>35</sup> 〈昭和十九年冬季代表大會議案紀錄〉，《香港基督教總會-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1943-1945）》，1943年2月27日。

<sup>36</sup> 鯨島盛隆：《香港回想記》，頁73~76。

鯨島牧師到任初期，難免讓香港教會領袖有所芥蒂。可是，當相處遇久的時候，香港教會領袖逐漸接納這日本牧師成為他們一份子。他們觀感改變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感受到鯨島牧師是真誠地幫助他們，而非日本政府安插在他們中間作政治的宣傳或控制。當有教會領袖被憲兵拘捕後，鯨島牧師運用日本人身分送一本聖經到該位被囚的領袖手上，這使得在被囚日子得到信仰上的安慰。<sup>37</sup> 此外，名牧張祝齡牧師在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被憲兵拘捕並受到酷刑對待，鯨島牧師立即嘗試進行營救，他回憶時指出：

最初有人告訴我這消息，查了許久才知道是憲兵隊的西區偵探部把他拘捕的，主持該部的，是牛山大尉，副手名叫石井曹長。我曾和平岡貞先生同去拘留所探張牧師，並與石井談話，請他善待張牧師，但石井說張牧師涉嫌是重慶方面間諜。我說：如真有罪證，也應依法解決，不可濫用私刑，人與人之間，應該以愛心平和對待（注日文「平和」即和平之意）。怎知石井曹長咆哮大怒，罵我說：「現在是戰時啊！講甚麼平和？」我見他這樣，也不想和他爭辯，只有轉向當時憲兵最高負責人野間大佐交涉，後來既見張牧師被釋出，我便沒有找菅波少將了。<sup>38</sup>

鯨島牧師直接質詢憲兵隊長，並表達「人與人之間，應該以愛心平和對待」，這或許就是他對平和的理解。當然，憲兵並不認同，戰爭就是戰爭，何來和平？無論如何，鯨島牧師嘗試以日本人身分站在香港人身前，嘗試保護他們。鯨島牧師不單冒着被自己國家的人懷疑或惡言相向，他甚至有被牽連入獄的心理準備。鯨島牧師曾有這樣回憶說：

我這樣自述，或許有人會認為我在憲兵面前非常義正辭嚴，理直氣壯，事實上剛剛相反。像我們這種傳教者之輩，在權力者面前

<sup>37</sup> 鯨島盛隆：《香港回想記》，頁24～25，76。

<sup>38</sup> 鯨島盛隆：《香港回想記》，頁50。

蓋處於無力的地位。所以每當我要去見憲兵時，必先禱告。由於祈禱「求上帝賜愛心與勇氣」，我才有膽量為那些可憐的被壓迫者，坎入那戒備森嚴，令人心悸的憲兵隊之門。有候被憲兵叱責：「為甚麼要這樣親切對待中國人。」有時則說：「現在正忙……還在調查中」等，三言兩語，被支吾趕出，滿心要救助正需要救助的人，卻常不能如願，我就是如此常常乘興而去，敗興而歸。在我屢次重複這種說情工作當中，我也覺到有一日或者我本身竟被猜疑而受拘捕，這時我只有勉勵自己；應該早作萬一之時的心理準備。<sup>39</sup>

鮫島牧師知道自己來香港的角色與責任，故此仍盡力援救及協助被憲兵拘捕的中國人。在華人教牧信徒無助的時刻，他施以援手，給予他們協助，這都使教會領袖信徒對鮫島牧師的恩情銘記於心，他們彼此的信任亦因此而建立起來。<sup>40</sup> 曾受到酷刑的張祝齡牧師戰後寫信給鮫島牧師說：「弟同是天國勞人，曾在危險火煉中，荷牧師愛護拯救，又何敢忘。我們祈禱間時刻以靈相聯絡，望救主祝佑牧師平安歸國……」<sup>41</sup> 此外，聖保羅書院校長胡素貞於戰後亦寫信給不同的人來保證鮫島牧師說：「在此我願確證：在其居港期間，鮫島氏以中華基督教總會最高顧問身分，給予中國基督教信徒繼續不斷、並無可數計的援助；因其援助，教會、學校及個人之財產始免於陸海軍當局的搶奪沒收，更因其努力，諸多無辜遭受憲兵逮捕之民眾，終得釋放脫險。對鮫島牧師之此一服務貢獻，香港諸基督徒無不由衷感激」。<sup>42</sup>

<sup>39</sup> 〈鮫島牧師感概話當年〉，《基督教週報》第 256 期，1969 年 7 月 20 日，頁 2。

<sup>40</sup> 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頁 94。

<sup>41</sup> 〈張祝齡牧師給鮫島盛隆牧師信件〉（1945 年 11 月 10 日），轉引於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頁 194。

<sup>42</sup> 〈胡素貞信件〉（1946 年 1 月 10 日），轉引於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頁 195。



## 五 結論：佛教與基督教領袖實踐「和平」上的異同

縱觀佛教和基督教，雖然都是主張和平的宗教，有其和平的宗教理論基礎，可是在香港日治時期不同人物所實踐卻有異同。兩個宗教相同的地方，都是因應日本政府的政治需要，故此被迫成立中央管理他們各團體的角色。佛教成立「香港佛教聯合會」，而基督教成立「香港基督教總會」。此外，兩者最高領袖必然是日本宗教徒，佛教是宇津木二秀，而基督教是鮫島盛隆。

然而，兩者差異之處，就是宇津木二秀在香港佛教團體所推動的佛教和平方向，是在意識形態上與日本政府的東亞擴張拉上關係，甚至更以政治角度來演繹佛教的和平觀念，達致協助政權的政治宣傳。對於被侵略的一方，縱使彼此都是佛教，但不見得一定接納空降的日本人宇津木二秀。加上宇津木二秀常為政權背書，那就令華人佛教領袖保持距離。對於促進日華佛教徒的和平合作，依靠政權的權威和武力，對政教關係沒有任何的幫助。加上涉及民族主義情緒所影響，就更不會達到政權的期望。

對於基督教而言，雖然同樣是日本人，但平岡貞和鮫島盛隆牧師的做法與佛教明顯不一樣。首先，在報章甚少提及平岡貞和鮫島盛隆為政權宣傳政治理念，他們都以香港基督徒的需要為最大考量。其次，他們並沒有刻意用基督教概念來解釋和平是甚麼意思，反而他們在行動上實踐和平，幫助那些被日軍逼害的香港教會，並且贏得香港基督徒的信任。而基督教的和平，就在他們之間彰顯出來。

誠然，在兩國戰爭或民族衝突的時候，縱使各自宗教和平理論如何完善，但現實卻難以影響戰爭的發展。作為宗教領袖，在這情況下往往身不由己地被徵召到某處，以宗教領袖形式來配合政權，正如宇津木二秀和鮫島盛隆需要到香港擔任宗教的領袖一樣。雖然如此，但任何宗教徒都是可以選擇與甚麼人站在一起，與對方建立甚麼關係。國家層面正在衝突，宗教層面未必容易化解。可是，宗教徒卻可以選擇與人為善，甚至頂着自己國家同胞政治壓力來協助受苦的人。他們不為政權背



書，更不會配合政權作政治宣傳。按這些日本基督徒的經驗，這樣確實贏得不少香港信徒的民心，或許這就是實踐宗教上的和平觀念。當然，這未必是宗教理論的問題，歸根到底都是人的問題。相比之下，在香港日治時期的日本基督教領袖所實踐的和平觀念，更得香港人認同。

### 撮 要

1941年12月8日，日本對香港軍事侵略。港英政府最終不敵投降，香港被日本佔領直至1945年為止。那時宗教活動雖然沒有被禁止，但他們的領袖卻需要跟隨日本政府的新政策和意識形態。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委任日本宗教領袖領導香港本地的宗教團體。本文主要是比較這些日本基督教領袖和佛教領袖的和平觀念。

### ABSTRACT

On December 8, 1941, the Japanese military invaded Hong Kong. The British governor of Hong Kong surrendered shortly and this began the Japanes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Hong Kong until 1945. Although religious activities were not prohibited, their leaders were required to follow the new policy and ideology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religious leaders were appointed by Japan to head the local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Japanese Christian and Buddhist leaders regarding their concept of "peace".